

# 抚育私人化困境及社会化公共养育探索

施芸卿

**[摘要]** 近年来,我国的生育鼓励政策效果不甚明显,其背后是养育成本高、压力大的困境。社会转型进程中,国家支持不足、社会力量缺失、市场化过度导致的抚育私人化和内卷化,是当前抚育困境的根源。抚育私人化的另一深处原因是公共养育的缺失,尤其是在我国计划经济抚育传统的延续下,对养育社会化的公共支持缺乏想象,符合转型后社会特点的国内实践尚处于探索之中。由此,本文借鉴美国社会的育儿经验,以城市公共空间和校内外养育支持系统为切入点,探讨建构一个多样化的公共养育社会环境的更多可能,以回应当前的抚育困境。最后,呼唤构建一种更具社会公共性的、扎根社区的、多主体协力合作的育儿体系,重塑国家、社会、市场和家庭在抚育中的职责边界,以弥合制度张力,回应现代化转型。

**[关键词]** 抚育私人化;公共养育;社会化公共支持;多主体合作

**[作者简介]** 施芸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732

**[中图分类号]** C913.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434(2021)01-0084-11

DOI:10.16524/j.45-1002.2021.01.007

## 一、抚育私人化困境和现实问题

伴随着我国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目前,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为鼓励生育,国家政策多次发力,在2011年和2013年实施双独和单独二孩政策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至今已近5年。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仅在二孩政策放开初期的2016年迎来一个小高峰,当年人口出生率为12.95%,为2011年以来的新高,但此后持续下滑至2019年的10.48%。可见,二孩政策尽管提升了二孩的生育率<sup>①</sup>,但对总人口出生率的提升效果并不明显。在“不想生”“不敢生”的社会现实问题背后,是社会转型进程中由抚育私人化引发的双重困境。

当前我国大多数家庭的抚育,都处于一种两面夹击的困境:一方面,在养育过程中能得到来自家庭之外的实质支持很少;另一方面,对孩子要求却在层层加码,亲职教育被高度精细化,因为大多数家长无法接受一个“平庸”的孩子,追求的又是一个几近“不可能”的孩子,他们被期待既能在层层应考中胜出,又充满新教育理念所倡导的创造力和自主性。

双重困境背后,是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国家、市场、社会、家庭对抚育职责分工的重组。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公有部门先从照顾领域中撤出,又随着教育市场化,进而从教育资源中逐步撤出,计划经济时期“我们的孩子”逐渐变成当前“我家的孩子”。国家的撤出给市场让出了大片空间,而家庭从市场中换取所需的过程,成为育儿在实践中被日益私人化的过程。加之生育政策的影响,儿童价值凸显,家内人力物力都向下高度集中。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经济资源不足、市场信任不够等,不得不由祖辈投入代际劳力、父母加大工作强度或经济资源集中等家内策略来勉力应对,其他部门在这一过程中缺失。

这背后可见两股张力:一是对儿童价值的认识。以社会转型前后为界,以提供抚育的实质支持为衡量,之

<sup>①</sup>陈卫.中国的两孩政策与生育率[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57-68

前是家内低、国家和社会高,之后是家内高、国家低且社会缺失。二是儿童培养目标的变化。以素质教育推行前后为界,之前的应试教育与当时的社会安排衔接;之后的素质教育,虽与全球化进程下的个体社会崛起相呼应,却与仍延续的总体性社会各项制度安排之间存在张力。当前由素质教育带来的“个性抚育”的呼声渐高,但主要成本仍由家庭和市场机构承担,使得抚育继私人化后进一步内卷化。由此,当下各家所体会到的养儿育女之难,源于社会转型后对抚育的公共支持不足,尤其是国家支持撤出后社会化公共支持体系一直未得以生长,加重了儿童养育的家庭负担,导致了当前诸多“不敢生”“不想生”<sup>①</sup>等现实层面问题。

##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抚育私人化的另一面,是儿童养育的公共性,这与不同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及背后对儿童价值和公私属性的认识息息相关。历史地看,随着家庭经济模式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转型,儿童养育经历了一个在成人视野中从无到有的过程;又随着消费社会的兴起,儿童养育又经历一个从“有价”到“无价”的过程<sup>②</sup>。但“无价”儿童属于谁?是单个家庭的财富,还是全社会的未来?换言之,抚育是否被作为一项社会再生产任务而由全体来承担,这在各国有着非常不同的理解,并衍生出不同的抚育支持体系。

就我国而言,传统中生儿育女属家庭私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不同阶段,国家有过不同程度的介入,因而儿童照顾政策经历了一个“建构—解构—部分重构”的过程<sup>③</sup>。但即使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公共托育一度达到高峰,也并不意味着儿童照顾是公共责任理念的兴起,国家仍倾向于最大化家庭的“抚老育幼”责任、最小化国家的支持作用<sup>④</sup>。改革开放后,育儿职责更是在市场作用下向家庭深度内卷,“照顾危机”凸显。当前,家庭作为照料责任的托底者的负担过重已引起普遍重视,近年来,学界有人发出“将国家带回家庭”<sup>⑤</sup>的呼声,希望国家能为家庭承担挡风遮雨的责任,建立友好的政策支持体系。

不过,以往从家庭政策领域出发的对抚育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的辨析及对抚育的公共支持的讨论,多从育儿过程中的具体主体和具体环节切入,如儿童养育成本<sup>⑥</sup>、托幼政策<sup>⑦</sup>、二胎下的亲职抚育困境<sup>⑧</sup>等,尽管直接明了,但对公共性的理解也较为狭窄,强调国家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缺乏进入具体日常生活的实践过程,也缺乏对自下而上的社会化公共支持路径的想象。在当前社会转型背景下,对“公共”和“支持”的理解都亟需拓宽,需要跳出对计划经济时期传统的路径依赖。对前者而言,需更关注当前随着市场化深入、社会力量崛起,正在逐渐浮现的基于社会自发提供的公共性;对后者而言,也不应局限于以原有公共托育为典型的底线、根本性的支持,而应对育儿支持体系加以拓宽,将养儿育女所生发的具体生活场景带进来。由此,本文着眼于儿童抚养和教育的整个过程,侧重其中能与学校、社区和城市互动且共享资源的方面,以美国低龄儿童养育实践为参考,来讨论拓展社会化的公共育儿支持的多种可能,以回应消除我国当前抚育公共支持不足困境的呼声。

### (一) 抚育私人化与城市公共空间

我国城市化历程将近30年,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但城市规划中“人”和“儿童”的视角仍十分欠缺。儿童抚育的国家支持不足、社会支持缺失且商品化和私人化过度的现状,在城市空间安排中同样体现出来,这是传统家庭研究及政策视角下被忽视的维度。

①2019年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4%,为1952年以来的新低。

②[美]维维安娜·泽利泽.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M].王水雄,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9.

③岳经纶,范昕.中国儿童照顾政策体系:回顾、反思与重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8(9):92-111.

④张亮.中国儿童照顾政策研究:基于性别、家庭和国家的视角[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1-35.

⑤吴小英.走出家庭主义的想象舒适圈[J].社会政策研究,2020(1):133-136.

⑥马春华.重构国家和青年家庭之间的契约:儿童养育责任的集体分担[J].青年研究,2015(4):66-75.

⑦佟新,杭苏红.学龄前儿童抚育模式的转型与工作着的母亲[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1(1):74-79.

⑧陈雯.亲职抚育困境:二孩国策下的青年脆弱性与社会支持重构[J].中国青年研究,2017(10):37-42.

空间安排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一个亲子友好的城市空间,能够很大程度上减轻抚育负担,支持育儿生活。但长期以来,我们的公共空间中专门为儿童设计、安全可及、朴素自然的活动场所有限,大多数时候,儿童只能在小区健身器材上、马路旁的绿化带中或停满车的小区空地中玩耍。而与之共存的另一面是,专门为儿童设计的空间被包裹在消费的场景下,如迪斯尼、欢乐谷等大型主题乐园,或商场融合教育、服装、饮食为一体的亲子层,或高价商品房小区中配套的儿童游乐园。这些空间的使用往往需要一定甚至不菲的经济付出,且不少空间装饰繁复,外观大于其实际能满足的玩耍需求。由此,从以儿童为视角的城市空间安排来审视我们当下转型过程中对抚育的公共支持,可以看见一个颇为悖谬的场景:一面是处于城市公共空间缝隙之中的儿童;一面是被包裹在消费华丽外衣下的儿童。换言之,在家庭和市场中被极度重视的儿童,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中却是被遗忘的。这使得儿童照顾和陪伴在家庭之外无处安放,若不屈从于商业场所就无处可去。这种倾向带来了不健康的儿童,他们被给予丰富物质的同时,患上了自然缺失症和交往缺失症<sup>①</sup>,也给父母和家庭增添了养育的负担。

值得欣慰的是,近两三年来,以儿童为主体的空间建设逐渐从消费领域延伸至公共领域,以城市规划学界为主,出现了一系列的尝试。沈瑶等提出以街道空间为关键切入点,以儿童参与为核心方法,以社区为关键层级,从游戏空间网络切入构建儿童友好的城市空间环境<sup>②</sup>;刘悦来等则探索以社区花园为公共空间载体的构建儿童友好社区的方式,提出花园空间友好和服务空间友好策略<sup>③</sup>;等等。规划师们的实践致力于以空间设计带动和提升儿童在城市里的参与感,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之路,收效明显。但这些探索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国内探索尚不能勾勒出城市中潜在的、可能由不同层次的公共主体运营的、具有抚育支持功能的各类城市公共空间的全貌,及育儿作为一种公共生活嵌入城市生活的逻辑,本文希望借他国案例以进一步拓展视野。

## (二) 抚育私人化与儿童个性养育

除缺少普惠型、社会化的公共空间支持体系外,当前在中国,养育之难不仅在“养”,更在于“育”。当前存在的教育双轨制,使“国民教育里最好的资源都退出了教育”,“教育成了家庭资源无限投放的无底洞”<sup>④</sup>。教育成为抚育负担私人化、内卷化的重要场域,密集母职进一步延伸,出现“教育拼妈”<sup>⑤</sup>“母职经纪人”<sup>⑥</sup>。教育加码带来了家庭职责的加码,双系成员全面卷入,形成关于儿童“养”与“育”<sup>⑦</sup>之间的精细分工,甚至极端化到“养”的不同方面(饮食、接送)、“育”的不同方面(不同学科),其背后同样是公共支持的缺失。

这一教育加码以培育面向未来、具有竞争力的儿童为理想,实践中主要体现在以个性培养、兴趣发掘、综合能力拓展为重心的儿童个人特色和自主意识的培养上,也被统称为“素质教育”或“博放教育”<sup>⑧</sup>。这一理念脱胎于美国新教育观,与中国社会转型后“个体社会的崛起”契合。儿童被日益当成一个逐渐浮现的主体,保

<sup>①</sup>张海水指出,即便不考虑经济成本,盈利性的儿童游乐场所也不能取代公共的儿童游戏空间,盈利性的儿童游乐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属于儿童的游戏空间。前者的逻辑是所追求“刺激”,最大限度地刺激儿童的感官以及由此而来的顾客的“盲目消费”,长期在这些场所进行游玩会打乱儿童平和的心智,因为这种儿童自身参与度极小、自主性很少发挥的机械活动,与真正意义上的游戏相差很远。参见张海水,《儿童游戏的缺失与游戏在儿童世界的价值——以儿童博物馆为例》,2013,详见 [http://www.cssn.cn/sf/bwsf\\_zhlwz/201310/t20131022\\_447333.shtml](http://www.cssn.cn/sf/bwsf_zhlwz/201310/t20131022_447333.shtml)。

<sup>②</sup>沈瑶,刘晓艳,云华杰,等.走向儿童友好的住区空间——中国城市化语境下儿童友好社区空间设计理论解析[J].城市建筑,2018(34):40-43.

<sup>③</sup>刘悦来,寇怀云.上海社区花园参与式空间微更新微治理策略探索[J].中国园林,2019(35):5-11.

<sup>④</sup>渠敬东.今天的教育双轨制成了家庭资源投入的无底洞[J].云南教育(视界综合版),2019(Z2):63-64.

<sup>⑤</sup>金一虹,杨笛.教育“拼妈”:“家长主义”的盛行与母职再造[J].南京社会科学,2015(2):61-67.

<sup>⑥</sup>杨可.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J].妇女研究论丛,2018(2):79-90.

<sup>⑦</sup>肖索未.“严母慈祖”:儿童抚育中的代际合作与权力关系[J].社会学研究,2014(6):148-171.

<sup>⑧</sup>刘云杉以“精约”和“博放”取代传统的“应试”和“素质”教育的说法。“精约教育”强调严格的制度与纪律,养成习惯,砥砺品格、磨砺意志,用“苦中苦”或“苦中乐”以实现“人上人”的目标;“博放教育”致力于将约束降到最低,主张解放学生,让学生在集体之外成长,让每个学生可以变得伟大。见刘云杉:自由的限度:再认识教育的正当性[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2):27-62.

护儿童创造力、提倡“玩中学”、培养批判性思维等,在国家大力推广的素质教育语境下获得正当性,继而由形形色色的市场机构赋予与国际接轨的先进性,成为城市中尤其是中上层阶层大力践行的教育目标。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这一教育目标主要在家庭和市场机构——私领域——中完成,小至各种课外兴趣班,大至各种民办中小学,市场提供了纷繁多样的选择,但都以转嫁于家庭的不菲成本为代价。这种被私人化的儿童个性培养,既缺乏公共性支撑的制度土壤,又无法与中国社会更根本的深层结构相连接,在日常育儿实践中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被化约的个性。以低龄儿童为例,学前接受的各种市场化早教,如艺术、外语启蒙等,多以保护创造力、启蒙自主性为卖点,但孩子入学后即面临学校的纪律要求,尤其在当前一些大城市中,由于人口密度、学校规模、育儿成本等种种原因,及科技进步带来的可能,这一代孩子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严苛、精细的权力技术<sup>①</sup>。由此,被新教育理想鼓励的“天性释放”与入学后的规训之间产生张力,协商的结果是一种可展现的又无损于纪律规范的个性:体现在学校,是以选修课、才艺展示、各类竞赛展现的素质教育成果;体现在孩子,则是由艺术、体育、学科竞赛等体现的“特长”。然而这种技能性的化约,限制了真正个性的生长,难以驱动儿童由内而外的探索。

第二,无根的个性。尽管校内课程看似更丰富,但校内规则增强、在校时间缩短、课间自由活动受限、课后时间又都被市场机构占据,使得同学间有意义的互动时间很少,学校教育中的社会化功能减弱。加之当前城市居住环境中邻里疏离,家内兄弟姐妹欠缺,使得儿童在学校教育之外同样缺少稳定的横向联系和支持性的社会环境,由此,个人的发展与自我、他人和社会脱离,“教育原本应是实现社会团结的基石,教育成就却以个体主义的方式导致了社会的分裂”<sup>②</sup>。

第三,有价的个性。当前课外机构盛行,看似内容丰富,实则性质单一,几乎皆为民办市场机构,其中又以大型连锁机构为主力,缺少其他类型的不同主体——如社会群体或公有部门——提供更公平的支持。不同阶层差距扩大,家庭资源纵向往下聚集,孩子们的竞争需要全家作战。

上述三个特点,显示了当前对儿童个性培养路径单一所导致的问题。究其根源,在于我们对儿童主体性的塑造,仍被包裹在总体性社会对原子化个人统一性的要求之中,其间的冲突和断裂,无法通过单一路径解决。换言之,社会化的公共养育路径的缺失,同样在如何培养一个素质教育理念下的理想儿童上体现出来,儿童的个性培养同样需要公共性的支持,需要一个家庭、学校、社区互为整合的养育体系。

由此,本文希望以我国现实为关切,从上述城市公共空间安排和儿童个性养育的系统支持两个方面,参考他国实践拓展经验边界,丰富我们对于社会化的公共支持路径的想象,并最终回应到对转型社会背景下,国家、市场、社会、家庭对抚育职责分工重组的关切。

### 三、案例与方法

下文以抚育的公共支持为焦点,聚焦其中的社会化、多元主体运作方面,这在我国尚属前瞻的研究领域。对美国社会的观察分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从空间切入,勾勒城市中具有抚育支持功能的各类公共空间的全貌,并分析其背后不同层次的公共性主体如何为家庭育儿生活提供支持。后半部分从对儿童的个性培养切入,观察学校、社区、课外教育机构等主体如何为培养一个有主体性的儿童提供微观公共性基础,从而使得其周围的小环境得以自治。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并不致力于讨论城市空间或者教育本身,或是两个国家的制度比较,而只是想借由这两个日常生活中最触手可及的层面,思考我国当下的社会转型中,国家、社会、市场和家庭在育

<sup>①</sup>例如,有的学校对孩子们每日着装、就餐、排队、举手、坐姿甚至说话音量都有规定,课间不允许在走廊追逐打闹。客观来说,普遍的高密度环境是导致严苛要求的一个原因,以笔者所了解的北京北五环外密集居住区中的某小学为例,新生一个年级可达到9个班、380人的规模。

<sup>②</sup>刘云杉.自由的限度:再认识教育的正当性[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2):27-62.

儿实践中分工的现状及其未来的可能性。更具体地说,社会性公共养育路径的缺失导致的养育负担过重,是我国当下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本文所立足的现实关怀,但相比较的是,这在当前的美国并非他们最急迫的问题。本文无意将美国案例作为样本,之所以借用,只是由于我国当前这方面的实践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积累尚不充分,边界还亟待拓宽,而这在美国的语境下有着长久的传统。本文仅希望借由他国的实践,对我国公共支持背后可能的多元主体及其合作方式作一个梳理,以此来扩充我们认清自身现状所需的想象力。当前的美国,更根本的问题比如社区邻里的衰落使得教育不平等加剧,公立教育质量越来越难以保证等,但这暂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此外,还需说明的是,就世界范围对抚育的公共支持而言,美国亦非最佳案例,一些欧陆国家乃至日韩,都有超出其的可圈可点之处。本文以美国B市为例,一方面是出于对我国当前因抚育私人化引发的困境的关切。抚育私人化源于市场对家庭及教育的侵入,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可谓是市场化程度最深的一极,以至于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利·拉塞尔·霍克希尔德<sup>①</sup>专门著书对私人生活能被外包的程度、商品化的边界进行讨论。另一方面,美国内部差异巨大,B市是美国一个历史上以文化上的多元平等著称的小城市,在社会参与的历史和氛围上具有典型性,因此,结合这两个因素,B市的观察能较有针对性地回应本文的核心关注点:在整个儿童抚育过程被市场高度侵入的状态下,社会化的公共性支持能提供哪些可能加以弥补和平衡。

B市位于北加州,与旧金山隔湾相望,占地面积27.1平方公里,根据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拥有112580人。公立教育传统悠久,拥有美国排名第一的公立大学B大学,不过较之高等教育,中小学公立资源在全美不算靠前,年人均投入8000美元左右。本文资料来源于笔者2018—2020年在该市生活期间所作的田野调查,以低龄儿童养育的公共支持为焦点,重点考察了城市的空间安排和校内外制度安排两个方面。在城市空间安排上,走访了各层级的儿童相关机构,与工作人员和家长交谈;在学校制度安排上,以C小学为重点,参与学校家长教师联合会(PTA, Parents and Teacher Association)发起的部分会议、学校志愿服务(如拍卖、嘉年华、阅读节等),并对部分老师和家长进行了访谈。此外,还收集了相关文件资料,并查阅了有关历史资料。本文遵循民族志的准则,见闻及反思仅限于当地。

#### 四、城市空间:多主体的公共养育支撑

城市空间是B市育儿公共支持的重要方面,大量面向公众、低成本、专门化的亲子活动空间承担辅助育儿功能。空间运营需要主体,形态丰富的公共育儿空间背后,是源自国家和社会的不同层次的公共性推动的多元主体,主要有三大类型:国有力量为主的公立图书馆;社会运动驱动的社区游乐场;非盈利组织运营的儿童体验中心。此外,各主体间还灵活协作,生产出第四类基于市民文化活动的即兴、流动育儿空间。

##### (一)国有支持为主的公共图书馆

美国公立图书馆以联邦、州和市三级政府资助为主,是市民生活和城市空间的重要部分,从三个方面支持城市育儿生活:一是密度高。据美国图书馆协会统计,全美共有公立图书馆16536座,犹如毛细血管遍布城乡各地。以B市为例,共有总图书馆1个、社区图书馆4个、工具图书馆1个,4-5平方公里就有1个,具有很好的可及性。二是服务范围广。最重要的是全年龄覆盖,而且每个图书馆都设有专门的儿童阅览区,提供从0岁开始的幼儿读物,并设有亲子共读、儿童玩耍区,以提高对儿童阅读中难免吵闹的容忍度。此外,图书馆还与各博物馆、儿童机构及视频网站合作,提供优惠门票和免费资源,丰富城市亲子生活。三是“活”的社区中心。除资源外,图书馆每周都组织丰富的常规活动,同样覆盖全年龄段的儿童,并各有侧重。以2020年3月份为例,为儿童提供的活动有:各年龄段的故事或读书会(婴幼儿、4-5年级、中学);家庭故事会、亲子游戏工作坊、家庭

<sup>①</sup>[美]阿利·拉塞尔·霍克希尔德.我们如何捍卫私人生活:外包,便捷背后的破坏[M].朱钦芦,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209-219.

瑜伽;提供材料或技术指导的乐高搭建、国际象棋、编织俱乐部、手工工作坊;提供生活服务的免费诊所、心理咨询、灾难准备;等等。为青少年提供的活动则更有技能性,如动漫俱乐部、诗歌之夜、虚拟现实、SAT辅导、计算机初学辅导、编程、ESL(非英语母语者英语提高)、作者演讲、领导力培训等。此外,还有贯穿全年的特色活动,如科学、女性、黑人、太空等不同主题月及合唱、戏剧、音乐会等演出,大量非盈利组织或个人志愿者参与其中。其中,市图书馆和社区图书馆还略有不同,社区图书馆周末的手工活动规模更小,设施更简便,成员联结更为紧密,图书馆因之成为社区居民生活的纽带。

## (二)社会运动推动的社区游乐场

游乐场在美国的发展有近两百年的历史,是一个由社会力量和公共参与推动的典型例子。“游乐场运动”(playground movement)始于19世纪中期,旨在以“基于社区的休闲”来应对工业化及城市化的危机:拥挤不堪的邻里、疲惫不堪的工人及在危险环境中玩耍的贫困儿童。随后,在运动的推动下,游乐场的意义被不断丰富:从个体休闲到社区整合,再到教育功能,再到覆盖全年龄段的娱乐,最后扩展至全民艺术和福利。在这个过程中,社区娱乐也日益结构化和组织化,如美国游乐场协会(American Playground Association)于1900年成立,后演变为国家休闲协会(National Recreation),以及现今的国家休闲和公园协会(National Recreation and Park Association)。在运动推动下,美国游乐场数量从1909年的336个城市有1535个游乐场,至1948年1917个城市有13520个游乐场<sup>①</sup>,40年间增加了8倍之多,奠定了游乐场和公园在市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从形态上,也经历了初期的沙子游乐场(1866-1930)、固定模式游乐场(1930-1970)、麦当劳游乐场(1970-1980)、冒险游乐场(1970-1980)几个主要阶段,直至当前与艺术结合更紧密的新式游乐场及街区中的即兴游乐场(Pop-up Playground),体现出随着时代变迁,全社会对想要培养怎样的孩子的一再思考<sup>②</sup>。

至今,游乐场仍是美国城市中面积最大、可及性最高的公共育儿空间。它们高密度地嵌于居民区周边,对儿童有很好的可及性。不同于商场里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型机械设施,这些由攀爬、滑行、钻筒、走梯、荡秋千等功能部件组合而成的无动力游乐场朴素、安全,有两大特点:一是分龄,分为5岁以下、5-12岁和青少年三组,配以不同的秋千、滑梯或球类运动场地;二是设施本身安全坚固、转角光滑,地面铺以很厚的橡胶、沙子、软木屑,使孩子即便跌落也能得到很好的保护。游乐场旁边的公园中常常竖着一块牌子,写着“Welcome to Your Park”,时刻提醒着市民们在自己城市中的主体性。

## (三)非盈利组织运营的儿童体验中心

全美有2000多个专门的儿童博物馆。不同于传统博物馆、亲子乐园和早教中心,儿童博物馆是非盈利组织运营的典型类型,旨在营造一个非正式的婴幼儿学习场所,并提供一定的照料服务。大型儿童博物馆通常由政府以提供低价土地、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企业及基金会捐赠,当地非盈利公益组织运营。B市的儿童博物馆规模较小,由一群父母及教育者创立,主要依靠门票和捐赠运营,以学龄前儿童为主要服务对象,以艺术启蒙为特色,分有搭建、戏水、阅读、模拟农场、超市购物等几个区域。

<sup>①</sup> 详见游戏和游乐场百科全书网站词条“Playground Movement”, <https://www.pgpedia.com/p/playground-movement>。

<sup>②</sup> 游乐场作为对工业化、城市化的回应而兴起。全美第一个游乐场是1885年在波士顿街头出现的“沙子公园”(sand garden),旨在为在街头巷尾车流中穿梭的孩子提供安全玩耍的地方,并解决社会隔离问题。随后的理念演变为有监管的玩耍有助于孩子的道德培养和身心健康,并且休闲娱乐有助于社区团结。因此,在第二阶段,心理学家、儿童发展专家参与游乐场设计,旨在通过运动开发儿童体育技能、社交能力等,游乐场逐渐成为城市标配,并延伸到乡村。这一阶段奠定了分年龄设计、中心装置主导、分块计算成本及严格的安全原则,影响至今。随后进入“游乐场的麦当劳化”阶段,当大量重复的游戏机械使玩耍也进入了标准化模式,限制了孩子的想象力和好奇心,人们再一次反思:安全的界限在哪里?是不是需要把风险重新带回游乐场?由此,第四阶段的“冒险/垃圾游乐场”(adventure/junk playground)兴起,设计者收集旧箱子、管子、石头、绳索等,让孩子使用铁锤、锯子、刷子等工具创造自己的游乐场。与原先对安全的完全摒除不同,这些游乐场虽中有一定的风险,但在成人监管下可控,以使孩子们在尽量真实的环境中体会梦想实现的快乐。见翟静. 美国户外游戏场的演变[J]. 美术研究, 2011(8): 87-88; Amanda Erickson, “The Politics of Playgrounds, a History”, (2012-03-14), <https://www.citylab.com/design/2012/03/politics-playgrounds-history/1480/>。

与此类似的还有儿童戏剧、舞蹈、画室等小型机构,特点都是兼具亲子性与社区性。以B市儿童博物馆为例,一方面,它提供与校内教育衔接的灵活照料时间,成立父母社群,并不定期地举办木偶剧、儿童画展、音乐会等活动,促进家长之间的学习和交流;另一方面,它雇佣本地兼职大学生、艺术家和音乐人,以为社区提供志愿服务等方式扎根社区,为各类以儿童与家庭为服务对象的团体和机构提供聚集的场所,成为有价值的社区资源。

这一类别下的另一种典型空间来自于以大学为首的大型教育及科研机构的资源辐射。B大学艺术博物馆在专项基金的资助下,开展每月一次的“画廊+工作室”儿童艺术公益项目,由本地艺术家带领孩子们看展览并创作;在全美科技领先的L实验室设有儿童探索中心;认知实验室则通过儿童认知游戏来招募实验被试;学校下属植物园不定期地开展植物认知教育;等等。此外,学生活动也常以城市中的儿童为对象,如女科学家日、校园开放日等,多以简单易上手的科学小实验为主,为儿童从小创造“亲科学、亲艺术”的氛围提供了多样化、低成本的育儿空间。

#### (四)多方协作生产的流动空间

除上述各种不同层次的公共主体运营的常规空间外,田野考察中还观察到另一类极有特色的流动空间,即由多方协作生产的大量“节/日”(Festival/Day)活动。这些活动常临时占据广场、公园、街道等公共空间,小至某家庭/社区俱乐部在广场自发的街头募捐演奏,大至节假日的市民狂欢,其频率之高,使之成为社区家庭生活的重要内容,也因之提供了不可忽略的公共育儿资源。

以公有部门为引导,不拘一格的承办主体(个人、机构、市民团体、政府部门)是公共文化生活的强大动力。“B市公园和休闲管理部”作为官方城市活动主办者,组织的特色活动贯穿全年,如传统节日类,复活节(公园/组织孩子捡彩蛋)、万圣节(某社区/要求各家都做好装饰让人们来讨糖)、国庆节(水滨码头/烟花和音乐)、圣诞节(街区特色装饰)、地球日(海滩清洁)等;城市特色类,风筝节(海滨/风筝表演和自由放风筝)、巧克力粉笔节(某街区人行道/艺术家作粉笔画)、公园系列音乐节(市内各绿地/乐队演奏、手工艺设摊)、社区电影节(社区绿地/爆米花)、帆船节(海滨/帆船出海体验、儿童冒险游乐场)等;体育运动类,儿童水上运动、儿童三项全能、滑板、足球等(根据 city of B 官网整理)。

对于公共育儿支持而言,上述这类流动、即兴空间最重要的启示在于城市空间使用的灵活性。在一场盛大的市民节日中,笔者观察到这类临时节庆空间甚至还可以通过“封路”进行。活动当日,警察在预定路段两端设下路障使之成为临时步行街:主干道用于市民团体趣味游行;道路两侧摆设小摊,包括地方特色手工艺品、社区商铺、儿童培训机构等,间杂着数个小吃摊和乐队;两端则是儿童游乐区,当天搭建了摩天轮、海盗船等大型娱乐设施,活动后即拆除。

这种城市空间的使用方式令人印象深刻,背后有两大支持:一是灵活友好的城市空间管理制度,街道经批准后可以用作市民公共活动,并有警察协助维护秩序,提高了城市公共空间的利用形式和效率;二是各主体间“搭积木式”的空间协同生产机制,也使大型活动可复制且易更新,并有很好的兼容性。在这些频繁的活动中,只需要将主题活动版块、儿童娱乐版块、小吃快餐版块、地方手工艺版块等有序拼搭起来,就便捷有效地生产出不同的流动育儿空间。

由上可见,在这四类空间的作用下,育儿生活与城市生活融为一体。这背后是来自国家、社会组织、小型市场机构等不同层次的公共性力量的推动和合作。虽然这些空间规模通常不大,但有强社区性、高可及性和多元主体运营的特点,如毛细血管一般使家庭育儿生活嵌入城市生活,体现出社会对于抚育的向心力。

## 五、儿童养育:互为整合的公共养育环境

非洲有句谚语:养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由此可见,抚育环境中便利可及的公共支持意义重大。在我国当前的抚育现实下,社会化的公共养育路径缺失,由此造成的缺口大量地由市场机构弥补;同时抚育要求提升,尤其体现在素质教育语境下的个性/特长培养上。这种完全由一家一户自己承担的方式导致了个性培养的化约、无根和有价的问题。在此,以B市为例,回到当下风行的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美国新教育观”所生发的具体社会情境,可以看到,在当地,对儿童个性的理解更为宽泛,并有扎根于学校、社区和课外机构的公共性基础,各主体之间功能互补,从而使整个制度从个人、家庭到国家、市场、社会互为整合,减少了制度之间的冲突和张力。

### (一)基础性的校园支持

美国社会的“个性”养成,基于一套看得见“个人”的制度安排。“看见儿童”的新教育理念,从家庭到校园连续贯通,以公立学校为例,尽管已被普遍认为较之私立学校对儿童的个性需求照顾不足,但将孩子视为独立主体的理念仍随处可见,从直接的教学来看,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最直观的教室陈设。教室里有每个学生名字的地方不下十处,并大多融入教学设计中;墙上有全班学生的自画像;走廊里有每个学生写作展示;每个学生还各有一个邮箱放当天的学校材料,一个阅读盒子和一个作业盒子放自己的学习资料。二是教学方法,如声名在外的分级阅读体系,老师根据每个学生的能力水平给出不同难度的学习材料。此外,老师对学生可能受到的从众压力极为警惕,“你可以和别人不一样”(It's OK to be different)/“你不一定要做某事”(You don't have to do...)是常听到的两句话。

在教学之外,孩子常有机会在学校活动中展现自己的个性,如在学校举办的万圣节、睡衣阅读日,孩子们可以穿得千奇百怪来到学校,低年级的孩子还可以带上自己的玩偶。日常校园行为规范的约束也较少,仅对考勤较为严格,而在日常课堂和队列中则可以形态各异。

这一教学原则也改变了学生与老师的关系。C小学的班级以老师名字命名,每个班主任都有自己的固定教室,不随孩子升级。不同教室的陈设、资源因老师能力和风格不同而差异巨大。在每学年结束前夕的班级展示中,孩子可以任意参观各个教室,以选择自己心仪的下一学年的老师。

大体上,就对个性化的支持而言,学生在公立学校与校外教育机构内体验到的氛围没有明显冲突。两者的区别只在于,私立机构老师学生比更高,个性照顾更细致,且可以填补一些学校教育的空缺,如提供学校放假时段对孩子的照顾,或开设学校没有的课外班。在这套连续的环境中,个性的展现是立体的,不局限于技能<sup>①</sup>;每个人都有被看见的机会,而不必一定要成为“榜样”。

### (二)平衡性的社区支持

B市对儿童个性发展友好的外部环境不仅体现在校园中,还延伸到校外的社区和共同体中。比如,公立学校经费除学区拨款外,还有一大部分需自筹,C校2019年度的筹款目标为16万美元,为此,PTA设计了两场大型活动——“抽奖”和“拍卖”,前者以学生为主,后者以家长为主——来调动学生和家長为学校募捐。在“抽奖”活动中,学生们需要卖出学校下发的空白奖券,为此,孩子们在超市门口、社区游乐场等地各显神通,或卖自己烘烤的曲奇,或转卖超市点心附赠自制饮料,或卖各式小手工作品等等,以便过往路人购买,为学校筹款。“拍卖”则是年度最盛大的筹资晚会,家长们自愿买票参加。在活动中,孩子们的个性得到另一种形式的展现——独一无二的竞拍品,其中的大部分与孩子们在校生活有关,如由全班每个人的美术作业制成的装饰画,或集体创作的班级绘本,等等。仔细翻阅,个人特色跃然纸上。

<sup>①</sup>当然,美国也有对儿童技能性的个性培养,被称为“竞争性课外活动”,指由大人组织的、有参与记录和奖项的活动,书中以国际象棋、舞蹈、体育运动为例。参见Levey H L. *Playing to win: Raising children in a competitive culture* [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1-24.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个性发展是把双刃剑,对个性化的鼓励,不可回避的另一面是整体结构松散、个人意识过强的问题。在上述案例,由单一的校园环境向更全面的社区共同体延伸起到了平衡作用,使个性化过程同样是社会化过程。个人需求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平衡是个人主义下教育的重要方面,正如资深的K班班主任A女士在访谈中所说:

对于刚入学的K的孩子,我们会有一个“工具箱”(toolkit)来教他们一些基本规则。其中有一个“个人空间工具”(personal space tool)。我告诉孩子们,这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有个大泡泡。我有我的泡泡,你也有你的。当你需要空间的时候,可以说:“不要戳破(pop)我的个人空间泡泡”(personal space bubbles)!这样他们就比较理解。

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叫“共情工具”(empathy tool),我会教他们摆出天平的手势(双手左右摊开),这边是“我需要的是什么”,另一边是“我们团队需要的是什么”,这样衡量左右两边的重量(双手一上一下),找到自己与他人的需要、情绪、处境之间的平衡。这里的关键是“我关心自己,我也关心别人”。(C校PTA教师代表A的访谈,2019年3月11日)

### (三)多样化的课后支持

作为个性培养,课外班也是题中之义。美国公立小学放学早、假期多,普遍没有祖辈介入,“三点半后”同样是个难题。公共化的课后支持的基本策略是将基本照顾和进阶照顾分离,前者以国家和社会为主,后者以市场和社会为主。

基本照顾也称“课后托管”(afterschool care),以提供食物、安全等基本照料为主,辅以简单的阅读、数学指导,主要为衔接儿童放学与父母工作时间,这对低收入家庭尤其母亲尤为重要<sup>①</sup>。公立部门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根据学生家庭情况,B市提供两个支持力度不同的项目。

B项目由联邦政府儿童营养办公室及儿童发展部、加州教育部为主资助,致力于创造一个“安全、有营养的环境”,支持每个孩子达成“学业优秀、情感发展、生活健康、自我表达”的目标。在所有项目中的支持力度最大、照料时间最长(全年240天提供,含早晚托)、减免力度最大(费用依家庭收入分档,对在州平均收入40%以下的家庭免费),全市学生皆可申请,经济条件最差、照顾需求最迫切的家庭可获得优先权。申请需提供:(1)家庭需求原因(如找工作、工作、求学等);(2)家庭申请资格;(3)家庭收入;(4)家庭规模;(5)家庭住址证明。此外,对进入项目之后的接送、付款、请假等都有严格规定【B市学区(教育局):《B项目家庭手册》,2018年7月】。

L项目由加州教育部为主资助,没有联邦资金介入,在上学日(180天)提供,仅限本校学生申请,费用依家庭规模和收入分为以下六档减免,无全免。

表1 K班每月托管费用收费标准明细表

单位:美元

2人家庭收入	3人家庭收入	4人家庭收入	5人家庭收入	6人以上家庭收入	5天费用	4天费用	3天费用	2天费用	1天费用
0~1819	0~1949	0~2166	0~2512	0~2859	60	55	40	28	16
1820~2328	1950~2651	2167~3032	2513~3618	2860~4331	85	80	60	44	25
2329~2838	2652~3353	3033~3769	3619~4422	4232~5061	175	160	125	85	50
2839~3355	3354~3953	3770~4392	4423~5280	5062~6069	295	280	215	150	86
3356~3839	3954~4742	4393~5646	5281~6549	6070~7452	415	395	305	215	124
3840以上	4743以上	5647以上	6550以上	7453以上	475	450	350	245	140

注:资料来源于《L项目家庭手册》,B市学区(教育局),2018年7月;该手册自2017年7月1日开始执行。

<sup>①</sup>据《美国三点半以后》托班研究报告显示,83%的父母认为托班帮助他们保住了工作,75%的父母(其中80%的母亲)认为托班使他们工作时更安心。低收入家庭更需要晚托项目,如果有机会,50%的低收入家庭孩子希望能参加一个晚托项目,而更高收入的孩子只有34%会选择。参见:<http://www.afterschoolalliance.org/AA3PM/>

从表1中收费标准来看,由联邦或州经费介入的公立部门支持构成课后托管的主体,对低收入家庭有明显倾斜,可减免相对较大且易申请,且能得到校车接送,但这类托管班名额相对紧张,有时需要排队。为弥补这一缺口,大量社会组织参与其中。这类组织多基于本地社区,有少量减免名额,收费介于公立部门和市场机构之间,能自行安排接送或申请校车。除基本照顾外,社区社会组织提供的托管还会结合自身优势开展特色活动,如传统非盈利组织YMCA以自带场馆提供游泳课,JCC<sup>①</sup>附近有岩石公园,常由老师带去户外活动;BYA<sup>②</sup>则与大学生志愿者合作,侧重提升孩子的阅读、数学和社交技能,等等。

进阶照顾则被称为“充实性课程”(enrichment class),类似我们理解的课外班,提供基于个人兴趣的技能学习,如STEM科学课、戏剧、美术、编织、烹饪、二外、国际象棋等,小型市场机构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较之基本照顾,进阶照顾收费较高,40分钟一节课需20-30美元。在节假日中,这类课程演变为各类主题“营”(camp),以便孩子兴趣得到集中强化。以B市提供的夏令营导览为例,项目共计13大类,年龄跨度5-15岁,涉及艺术、游乐场、信息技术、自然教育、水上运动等。

夏令营成为美式育儿中支持儿童个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式,选择极为丰富,但价格不菲,每周在300-450美元不等。因此,除市场机构之外,社会组织和公立部门也有加入,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各类兴趣“俱乐部”(club)是美国常见的社会组织,以成员的志愿服务降低成本,延展了个性培养的社会可及性。以C帆船俱乐部为例,俱乐部向公众开放,学生只需99美元即可成为3个月的会员,由俱乐部成员带领学习帆板冲浪课程。夏令营也如此,社区中心提供的夏令营包括艺术、探索、运动3类,虽不及市场机构课程细致,但胜在经济,一周收费100美元左右。此外,B市公园和休闲部门利用公园资源提供户外营,B大学利用下属教育学院、科学实验室和植物园等提供特色夏令营,也因其质优价廉而备受孩子和家长的欢迎。

可见,与城市育儿空间类似,课后支持中最鲜明的特点也是主体多元、性质多样。其中,公有部门和非盈利组织扮演了重要角色;小型市场化机构也具有一定的公益性,与社会组织边界模糊;没有大型市场化的教育企业;几乎所有机构都有很强的在地性。整体环境富于公共性,为儿童的个性发展铺设了多条路径。

## 六、迈向更具公共性的育儿想象

社会转型后国家支持不足、社会力量缺失、市场化深入导致的抚育私人化和内卷化,是我国当前抚育困境的根源,为此,我们期待有一种重回公共性的抚育想象。本文借对美国社会育儿的观察,以城市公共育儿空间和校内外支持系统为切入点,探讨拓展育儿公共支持的多种可能,以回应当前我国的这一困境。

在此,以抚育为议题,有必要重新探讨中西方在不同的历史、文化、制度脉络下对于“公共性”的两套不同的想象。在中国的语境下,更容易看到的是一种源于国家的、自上而下的公共性,更侧重于“公”的逻辑。以城市育儿空间为例,尽管近年来城市公园、博物馆、市民公共文化空间等场所正日益增加和完善,但仍基本沿循一贯的大规模、大投入、专门化运营管理的思路。其优点在于效率高,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查漏补缺,达到不断更新的基本要求,但缺点在于由于成本过大而难以普及,较之我们城市的居住密度,此类设施存在可及性不够、过于拥挤、到访成本过高等问题。这种公共性带有总体性社会延续的国家福利性质,市民是被动的接受者,而不是主动的参与者,使用体验较为单一,对于育儿和家庭的支持还停留在浅层。

相比之下,对美国B市的观察则展示了另一种基于社会、自下而上的公共性,更侧重于“共”的逻辑。如前文中所述,无论是城市育儿空间,还是互为整合的学校、社区和课外机构,都呈现出一种小规模、多样性的状态,运营主体或基于在地社会组织,或基于兴趣团体,形成一种分散、协同的网络结构。这种方式下,社会组织

<sup>①</sup>基督教青年会(YMCA)及犹太社区中心(JCC)是遍布全国的两个常见的社区中心,源于宗教,发展至今已经成为综合型社区服务机构,日常活动中基本没有宗教内容。

<sup>②</sup>全称为“B市青年选择”(Bcity Youth Alternatives),参见<https://www.byaonline.org/about-us/our-mission/our-mission>

的成长相对缓慢,难以形成很大的规模,但能较好地促生内部交流,满足家庭对抚育的多样化需求,同时,与社区、城市的融合也较为深入。

当前,随着时代进步,“个人”的可见度正在提升,社会力量在逐步释放,我国也正在探索治理现代化转型的有效路径,以对多元主体有更多的包容。与此同时,“将国家带回家庭”也呼唤国家能为家庭承担遮风挡雨的责任,建立家庭友好的政策支持体系。可见,随着转型的不断深入,中西传统下这两套有不同侧重的公共性脉络需要有一定程度的融合。

值得欣慰的是,在本文收集材料和写作的同时,“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正在我国得到大力推进,深圳、长沙、上海、北京等地纷纷响应,并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在中国知网文献中以“儿童友好城市”为关键词搜索,研究数量自2017年后呈现出爆发状态,研究方向也从建筑规划领域拓展到教育、政治、社会等领域。在新阶段的探索中,儿童友好被上升至关于儿童权利的更高层次,儿童可以“自由表达自己想要一个怎样的城市,并有能力去影响城市里有关他们自己的决策”;可以“参与到家庭、文化、城市或社区及社会生活中的事物”<sup>①</sup>。伴随着这些尝试和讨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儿童友好之路正在探索。具体来说,我国需要在政府主导下引入多方主体,形成一套以社区为着眼点的、更具社会公共性的协力育儿支持体系。这一方向,不仅有助于增强家庭韧性,使其在承担人类自身再生产的重任时不那么孤立无援,而且也有助于弥合“个人的崛起”与我国独特社会体制之间的张力,从而从家庭和社区层面,回应当前的治理现代化转型。

[责任编辑:戴庆瑄]

<sup>①</sup>宗丽娜,文爱平.儿童友好型城市的中国特色之路[J].北京规划建设,2020(3):193-196.